

外國文學評論

*F*oreign
Literature
Review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主办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期刊

03 2016

外国文学评论

“日本人”的发现与再现：以森鸥外的小说《花子》为例 熊 鹰 (5)

《我的安东妮亚》中内布拉斯加边疆景观的国家维度 陈 榕 (20)

《寡妇兰特氏》中女性意识主导下的性政治隐喻 郑 伟 (41)

从《一个清白罪人的忏悔》中的二重身看现代城市恐惧 郑荣华 (61)

“浪漫的”科学

——论梭罗后期写作的转向 杨 靖 (75)

伊迪丝·华顿是种族主义作家吗？

——以《欢乐之家》为例 潘志明 (93)

叙事谣曲与现代民权运动：

格温朵琳·布鲁克斯诗歌中的提尔私刑案 黄 怡 (113)

作为“国家认同”工具而被经典化的《源氏物语》

与“物哀” 刘金举(127)

罪恶、灭亡与延续

——论武田泰淳的《蝮蛇的后裔》 史 军(141)

《日诞之地》中的地理景观：人文主义地理学视角 郑 佳(155)

物外无意：威廉·卡洛斯·威廉斯风景诗管窥 傅 浩(169)

里尔克《布里格手记》中的“看” 陈 早(182)

《千万别让我走》中道德冷漠的社会生产 201)

吸收与反驳：托尔斯泰与欧洲学界对话妇女问题 陈新宇(216)

《外国文学评论》投稿说明 (239)

编后记 (240)

《千万别让我走》中道德冷漠的社会生产*

内容提要 通过探讨石黑一雄《千万别让我走》中道德冷漠的社会生产,本文认为,由于合法权威体系对暴行的授权,个体进入代理状态,悬置自我道德判断,忽略自我道德责任,被动执行权威下达的非道德命令,并将道德关怀转向上级权威而非受害者;权威体系也通过赏罚制度钝化个体的道德判断,助长其道德冷漠。由于精细的社会分工,作为中间人的大多数施暴者难以看到自身行为的远距离后果,并用技术责任代替道德责任,最终在道德上掉以轻心。由于受害者的身、心被隔绝,他们的“脸”被抹去,普通人带着道德冷漠的眼光看待受害者,施暴者则将受害者当作没有“脸”的身体,因此能够忠实地履行邪恶职责而保证自我良知不受损害。

关键词 道德冷漠 合法权威 社会分工 《千万别让我走》

《千万别让我走》是“英国文学移民三杰”之一的石黑一雄2005年出版的作品,是他创作生涯的第六部长篇小说。在这部小说中,石黑一雄想象了一个文明程度极高、科技高度发达、克隆人被批量生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克隆人作为人类身体器官的备份而被培植与抚育,成人后开始“捐献”身体器官直至心力交瘁而死。这些克隆人形体上与普通人无异,日常生活中也和普通人一样有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抱负,辛勤工作,热爱生活,自尊自爱,但却像牲口一样被屠宰,直至悲惨地死去。由于石黑一雄在小说中极少涉及高科技,研究者一般认为

* 本文为“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资助”及“中央财经大学学院科研支持计划资助”(011650314014/010)的阶段性成果。

它无关克隆技术,而是关乎阶级^①、大屠杀^②、当今经济秩序下的受害者^③、人与动物之关系^④、个体心理发展^⑤、“我们”与“他们”之间的矛盾^⑥、殖民剥削^⑦等问题。但值得深思的是,在小说所描绘的这个文明化程度极高、科技高度发达的社会里,发生着残忍地切割与“我们”无异的他人的身体器官直至其死亡的事情,这难道不是极其野蛮而又令人发指的吗?这种暴行难道不与文明社会的宗旨背道而驰?文明人何以能够克服对受害者的同情,克服自我良知及道德冲动,麻木不仁地对受害者施暴或坐视暴行?换句话说,小说中个体乃至整个社会的道德冷漠是如何产生的?

一、合法权威与道德冷漠

该小说中存在着一个高高在上的合法政权,对其公民实施福柯所说的“让人活或“不让”人死的生命权力^⑧:让他们更加健康、长寿,提高其生命质量和价值,避免疾病和死亡。但自相矛盾的是,这种“让人活、“不让”人死的权力也会对生命进行杀戮,因为生命权力的逻辑是“如果你要生存,其他人就必须死掉”^⑨。这样,生命权力就在“我”的生存和其他人的死亡之间建立了联系——为了让“我”更健康、长寿,就必须有他人死亡,有他人作为牺牲品。正是基于此,大批克隆人在实验室的试管里诞生,长大成人后开始“捐献”身体器官直至死亡。从这些克隆人受害者的经历可以看出:这个实施生命权力的合法权威体系不仅制定了屠杀受害者、获取其身体器官的计划及各种规章制度,建立了众多抚养受害者的机构,而且组织、协调多个部门及各种专业人士共同参与

① See Lisa Fluet, "Immaterial Labors: Ishiguro, Class, Affect", in *Novel*, 40.3 (2007), p. 267.

② See Ann Whitehead, "Writing with Care: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 in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52.1 (2011), p. 76.

③ See Shameem Black, "Ishiguro's Inhuman Aesthetics", in *MFS*, 55.4 (2009), p. 785.

④ See Eluned Summers-Brunmer, "Ishiguro's and Coetzee's Imaginary Animals", in *Mosaic*, 39.4 (2006), p. 145.

⑤ See Deborah Britzman, "On Being a Slow Reader: Psychological Reading Problems in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 in *Changing English*, 13.8 (2006), pp. 307-318.

⑥ See Henriette Roos, "Not Properly Human: Literary and Cinematic Narrative about Human Harvesting", in *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 24.3 (2008), pp. 40-53.

⑦ See Robbie Goh, "The Postcolonial in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 and Amitav Ghosh's *The Calcutta Chromosome*: Science and the Body in the Asian Diaspora", in *Ariel*, 41.3-4 (2011), pp. 45-71.

⑧ 详见米歇尔·福柯《性经验史》,余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3页。

⑨ Michael Foucault,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the Collège de France, 1975-1976*, trans. David Macey, eds. Mauro Bertani and Alessandro Fontana, New York: Picador, 2003, p. 255.

对受害者的施暴。因此，由于合法权威的授权与统筹规划，小说中施加在受害者身上的暴行是权威化的暴行。

权威化暴行的一个严重后果是，暴行执行者进入了代理状态（*agentic state*），亦即“个体将自我当作执行他人愿望的代理人”^①这一状态。个体一旦进入代理状态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个体不再认为对自我行为负责，而是将自我定义为执行他人愿望的工具”（*Obedience*: 134），而且“大多数人都按照命令行事，不管行为的内容，也不被良知所约束”（*Obedience*: 189）。鲍曼也进行了类似的反思，在考察德国权威官僚机构下达的关于屠杀犹太人的非道德命令在大屠杀中扮演的角色时，他指出：“权威命令让个体从对自己行为的道德衡量的忧虑中解脱出来——他可以心安理得地将这种忧虑留给命令他去行动的那些人去思考。”^②可见，代理状态能够赦免相当一部分行为者对所犯罪行或者恶行的个人责任，悬置其道德判断，导致其道德冷漠，这也体现在《千万别让我走》中。

在小说中，作为黑尔什姆^③最高权威的艾米莉坦诚她需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让玛丽-克劳德和其他人感到轻松，他们能够无忧无虑地过日子。还有你们这些学生。我为你们所有人操心 and 质问。只要我坚定不移，你们所有人的脑袋里就不会有任何疑惑。”^④艾米莉对黑尔什姆体系内的一切负责，“操心 and 质问”各种行为及后果，其他人则进入代理状态——他们只需执行权威命令即可，无需面对艰难的道德抉择，也无需对行为后果负责，因而能够“无忧无虑地过日子”。只要艾米莉“坚定不移”，其他人就不会有任何疑惑；可见，其他人实际上悬置了自我的道德判断，不再对行为进行是非判断，而是依赖权威的决定。同理，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艾米莉也并非最高权威，也只需承担部分责任，因而也在一定程度上进入了代理状态，丧失了对行为的道德警惕。

但即便在代理状态下，“道德[也]并没有消失，而是获得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焦点：下级按照完成权威下达任务的程度而感到羞愧或骄傲”（*Obedience*: 146）；关于道德的语言也因此有了新词汇，“忠诚、义务、纪律——全部都朝向

① Stanley Milgram, *Obedience to Authority*, New York: Harper, 2009, p. 133.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② 齐格蒙·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30页。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③ 黑尔什姆为小说中隔绝与抚养受害者的机构之名，凯西、汤米、鲁丝等小说主要人物均在此度过童年。由于某些监护人的努力，该机构比小说中政府建立的其他众多类似机构要人性化。

④ Kazuo Ishiguro, *Never Let Me Go*, New York: Vintage, 2005, p. 260. 后文出自同一著作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著名称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上级。上级是道德关怀的最高目标，同时又是最高的道德权威”（《现》：21）。这就是为什么在小说结尾，艾米莉在将受害者诞生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前来寻求真相的凯西和汤米后又懊悔地说：“当然，这一切都是严重违背规定的，玛丽-克劳德不该让你们进来。自然，我知道你们在这儿的那一刻就该将你们撵走。”（*Never*：259）艾米莉因为接待受害者、将真相透露给受害者而感到良心不安，这是因为在权威体系下，“纪律取代了道德责任。惟有组织内的规则被作为正当性的源泉和保证，现在这已经变成最高的美德，从而否定个人良知的权威”（《现》：30）。换言之，对权威的服从成为了首要道德准则，个体的良知及由此产生的对受害者的同情则必须被抑制和扼杀。对艾米莉来说，上级是她道德关怀的最高目标，她的首要任务是效忠上级，按照上级的要求办事；让她惶恐的不是受害者所遭遇的野蛮待遇以及她在受害者受害过程中所扮演的邪恶角色，而是她违背上级的规定，将真相透露给受害者。这表明艾米莉们的道德关怀不再是受害者，对他们而言，受害者的命运如何、遭受了何种痛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顺利完成了上级交给他们的任务。于是，忠诚与纪律这些人类社会极为看重的美德将个体束缚在邪恶的权威体系内，在延续暴行方面发挥着作用。

合法权威体系通过赏罚制度对个体进行的操控也可以成为道德冷漠的社会生产机制。在赏罚分明的体系内，服从上级命令、出色完成任务的个体得到奖赏，而不服从命令、无法完成任务的个体则被惩罚，道德就这样被简化为是否服从权威这种直截了当的选择。黑尔什姆的监护人露西是小说中少数尚存道德良知的个体之一，她难以忍受整个体系对受害者的欺骗和操控，因此寻找机会向他们暗示真相，甚至告诉他们：

正如我所见，问题是，你们被告知，又不被告知。你们已经被告知，但你们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并且我敢说，有些人很高兴让问题就这样。但我不这样。如果你们要有体面的生活，那么你们需要知道，并且恰当地知道……你们为了一个目的而被带到这个世界，并且你们的将来，所有人的将来，都已经被确定了……如果你们要有体面的生活，你们需要知道你们是谁，并且在你们每一个人前面的是什么。（*Never*：81）

由于上述“不当”言语，露西很快被开除，被迫离开了黑尔什姆。小说虽然没有交代露西之后的命运，但她显然受到了惩罚，为自己的背叛行为付出了代

价。在权威体系内，违背命令者必须被惩罚和隔离，以杜绝效仿者。为了避免惩罚，个体只能选择遵从当局所推行的行为标准，不再对行为进行道德思量，因为“把自己与社会对立起来显然是危险的，而追随他周围人的样板则更为安全，甚至也许不惜‘与狼共舞’”^①。实际上，权威体系做出的决定完全有可能低于普通人的道德水准，也完全有可能是非正义的，但是它却垄断了道德标准，通过立法、规则等形式告知个体何为“善”、“恶”，从而拒绝或者剥夺了个体进行道德判断及道德选择的权利。小说中的道德行为体现为对权威规则的反抗，但道德行为的主体却遭到权威体系的惩罚，因此，惩罚实际上起到了压抑个体的道德冲动、引导其道德能力通向一个社会设定的目标（包括非道德目标）的作用。

与对违规者的惩罚相辅相成的则是对顺服者的奖赏。小说中这个权威体系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也将受害者纳入了毁灭自身的体系中，让他们承担一定的任务，遵循同样的赏罚制度。遵守命令、出色完成任务的受害者被奖赏，反之则被处罚。例如，凯西由于在“看护员”职位上表现出色而获得上级奖赏：她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小屋，能够选择自己的看护对象。当获悉器官“捐献”的真相后，汤米虽然在黑夜中怒吼，以示对权威的抗议，但由于无路可逃，别无选择——在权威体系的高压政策下，反抗不仅无效，反而会招致严苛的惩罚^②——他很快接受了现实，继续将器官“捐献”当作可以献身的事业，并因为在“捐献”中的出色表现——身体恢复快，能够多次“捐献”——而受到了嘉奖：独享一间小屋。由于受到嘉奖，受害者在心理和情感上对组织产生了感激和依赖，进一步将自我束缚在邪恶体系中。对他们来说，顺从组织可以获得基本的生存资料，让生命暂时得以延续，于是本能地适应被宰割的现状，不自觉地自我融入权威体系中，照章行事。最终，受害者甚至可能心甘情愿地献身于权威体系，助其达成邪恶目标，例如，鲁丝就认为“捐献”理所当然：“当我成为一个捐献者时，我已经准备好了。感觉应该这样。毕竟，这是我们应该[原文为斜体]做的，不是吗？”（*Never*: 227）同时，权威的小恩小惠也能转移受害者的注意力，麻痹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于是，“超我的功能从对行为善恶的评价转移到了对个人在权威体系内作用发挥得好坏上”（*Obedience*: 114）。当汤米听说一个伙伴在第二次

① 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熊哲宏译，长春出版社，2010年，第62页。

② 受害者违规会招致惩罚，这在小说中有多处暗示。例如，在黑尔什姆流传着关于小男孩或小女孩违规逃离黑尔什姆，其尸体最终在黑尔什姆周围的树林里被发现的故事。从幼年时期的受害者被迫与外界完全隔绝这一事实来看，这些故事并非完全子虚乌有，而是暗示了逃跑者可能遭受的惩罚。鲁丝告诉凯西和汤米，她为了得到玛丽·克劳德的地址而大费周折，甚至几次冒着被发现的危险。

“捐献”后就“圆满”时，认为这“真丢脸。她才第二次捐献。很高兴那没有发生在我身上”（*Never*: 225）。在汤米看来，早早“圆满”的伙伴表现欠佳，辜负了权威的期望。他已俨然把自己当作了权威利益的代言人，将后者的贪念看得高于一切，站在其立场上谴责自己的伙伴，无视作为受害者的自己与伙伴所遭遇的不公及整个器官“捐献”事件的非人道。如果受害者尚且被麻痹，不自救，甚或更加卖力地为组织服务，深陷其中无法自拔，那又如何能指望他人的救助及施暴者的良心发现？

惩罚让个体对权威产生畏惧，不敢轻易再犯；与惩罚一样，奖赏也能强化个体对权威的服从，钝化个体的道德判断。对于施暴者而言，尽管他们从事的事业令人憎恶，但因为得到了合法权威的支持，他们也能够从中受益，因此大多选择服从组织，与组织保持一致——没有多少人能够承受由于违规而被惩罚、隔离及随之而来的孤独甚至死亡等沉重代价。就这样，权威体系通过赏罚制度不仅催生了个体道德冷漠，也让该体系得以永久化。

二、社会分工与道德冷漠

小说中的社会分工异常精细，筹划、种植、培育、收获克隆器官的任务被分配给不同的部门，每个部门只对一小部分任务负责。最高权威负责制定屠杀受害者、消费其器官的政策；掌握现代医学知识的科学家在实验室的试管里培育出受害者；监护人在政府建立的众多机构里将受害者养大，并且教化他们；各种教练在地处偏僻的空间里对受害者进行各类技能培训，确保他们成为合格的看护员；既有医生在受害者成长过程中定期检查他们的身体，确保其肉体健康，又有医生专门负责在手术室里切割其身体器官；某些上级决定这些克隆人何时开始器官“捐献”，何时进行下一次“捐献”；在恢复身体、等待下次器官“捐献”期间，看护员照顾他们的日常生活，安抚他们的情绪，陪伴他们到医院进行各种检查；后勤人员向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活资料，确保其生存……对受害者的暴力屠杀过程被划分为多个细微的功能任务，是一项以社会分工为基础、多个部门密切合作的集体行动，每个功能任务由时空上彼此分离的不同部门分别完成，这些部门彼此独立又相互合作，共同完成人体器官的生产。

社会分工显然能够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各个部门在合法权威的统筹规划下既充分发挥各自专长，又团结互助，从而批量生产出满足市场需求的商品——

身体器官；但它也同样能够导致各级施暴者的道德冷漠，麻痹他们抵抗邪恶的能力。在众多部门分工合作的语境下，工作自动从一个部门流向另外一个部门，每个部门自动为在等级与功能上处于流水线下一级的部门设置工作，“这种安排不仅导致责任分散，也减少了做决定的次数，限制了决定的范围……每一级只需要做出操作性的决定，考虑道德寓意的希望与可能性被大大降低”^①。不同部门之间的合作能够强化这样一种观点，即，正在进行的任务很正常、很合法。对于部门内部的行动者来说，他们会关注各自的工作效率、得到认可和升迁的可能性、相互间的协作、互助及责任以及所在部门的生产效率或者整个团队的凝聚力。任务的性质不被道德所评价，甚至变得与行动者完全无关。在权威支持的情况下，当行动者逐渐习惯各自任务，且任务变成例行惯例、机械操作时，他们就越来越将任务当作一项引以为豪的工作，希望获得成功，并且积极与他人合作。

此外，对于各部门的众多个体来说，由于劳动分工的精细化，对集体行动的最终成果（身体器官）有所贡献的大多数人和成果本身之间产生了巨大的时空差距；同时，在合法权威下达的生产及消费克隆器官的命令与克隆器官最终被切割及消费之间有很长的间距，且两者之间充斥着大量细微的行为和看似不相干的形形色色的行动者。拉赫斯称这种现象为“行为的中介化”（mediation of action），即“个人行为通过另外一个人来表现”^②，这个人“站在我和我的行为中间，使我不可能直接体验到我的行为。他也遮挡了我观看自己行为及其后果的视线”^③。行为中介化使得个体与其行为之间产生了社会距离，于是

我们很快忽略我们的存在状况，并且忘记——如果我们知道的话——我们行为的近距离特性及远距离效果……结果就出现了许多无人主动承担责任的行动……由于对其行为缺乏直观认识，即使最睿智的人也在道德中空中行动：对邪恶的抽象认知既不是一个可靠的向导，也不是一个适当的动机……我们不知道导致的痛苦，也不相信我们就是导致痛苦的人。^④

在小说中，参与对克隆人施暴的大多数行动者，如科学家、监护人、教练、护

① Herbert Kelman, "Violence without Moral Restraint", in *Journal of Social Issues*, 29 (1973), p. 47.

② John Lachs, *Intermediate Man*,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 1981, p. 12.

③ John Lachs, *Intermediate Man*, p. 12.

④ John Lachs, *Intermediate Man*, pp. 12-13.

士、后勤人员等，他们既没有参与制定消费克隆器官的政策，也没有直接目睹他们的死亡，更没有亲手操刀切割他们的身体器官，或将他们杀死。由于行为的中介化，他们看不见自身行为的远距离后果，也难以觉察自身行为与受害者的痛苦及死亡之间微妙模糊的因果联系，因而道德考虑的可能性消失了，或者被极大地削弱了。他们意识不到自己是否处于道德困境中，继续冷酷无情地从事本质上邪恶的任务。

石黑一雄含蓄委婉的文风及叙述者凯西对于痛苦轻描淡写的处理，令一些血淋淋的细节，如器官的切割过程、被毁坏的身体等，几乎全被省略，读者只能借助上下文语境来想象存在于那个文明社会里的血腥与恐怖的暴力场景。不过，尽管如此，小说仍然借助凯西的眼光向我们间接展示了鲁丝悲惨死去的情景：

她似乎强使自己的眼睛看到她的身体内部，以便能够更好地巡视和统率体内各部分的疼痛——那情形就像一个奔波于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三四个体弱捐献者之间的焦虑看护员……一阵剧痛使她扭动着远离我……她扭动自己的身体，看起来非常不正常，我正要叫护士拿更多的止痛片……那是捐献者在他们魔鬼般的战斗中时而会有的神志清醒的时刻之一。(Never: 236)

这是小说中唯一一处直接涉及受害者由于重要的身体器官被切割而惨死的情形，寥寥数笔就向我们暗示了受害者所遭受的暴力及巨大痛苦。临死前的鲁丝孤零零一人躺在一个房间里，暴力并没有被这个文明社会消灭，只是被圈进隔离区，大多数施暴者由于劳动分工而与之保持了相当的距离。随着有碍观瞻的结果从施暴者的视野中消失，这些本质上道德并不败坏的人就能够毫不犹豫地参与到恐怖行为中，漠视受害者的苦难，甚至残忍地对待他们。

社会分工导致的道德冷漠尤其体现在监护人身上。表面看来，艾米莉等监护人在克隆人的成长过程中扮演了师长角色——将受害者养大，教育并教化他们；但正如潘迪所说：“监护人不是保护者，而是看守。”^①他们的角色绝非其名称所显示的那样温情脉脉：他们实际上相当于监禁与拘捕人员，监视克隆人的一言一行，将他们监禁在与世隔绝的空间里，防止他们逃跑及与外界接触。他们也不是教育者或教化者，而是奴化者：采取种种措施对受害者进行洗脑，让他们接受被宰割的命运，将器官“捐献”当作一种职责。此外，监护人也是受害者与上级

^① Anjali Pandey, "'Cloning Words': Euphemism, Neologism, and Dysphemism as Literary Devices in Kazuo Ishiguro's *Never Let Me Go*", in *Changing English*, 18.4 (2011), p. 388.

权威之间的中间人，是权威下达的非正义命令的忠实执行者。可以说，监护人对受害者的看管和奴化教育是器官生产线上至关重要的一环，没有他们就没有被驯服的受害者。

然而，大多数监护人并没有意识到自身职业的邪恶本质，艾米莉甚至大言不惭地对凯西和汤米说：

看，我们能够给你们一些东西，一些甚至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够拿走的东西，并且我们主要通过保护你们来做到这一点。如果我们不这样，黑尔什姆就不是黑尔什姆……那些年我们保护了你们，我们给了你们童年……现在，看看你们两个！我真为你们两个感到自豪。你们在我们给予你们的基础上建立了你们的生活。如果我们不保护你们的话，你们就不会成为今天的你们。
(*Never*: 268)

如果撇开整个器官生产线，孤立地评价监护人的工作，艾米莉的话不无道理：他们将受害者养大，让他们身体健康、心灵受到教化。但在整个器官生产线的语境下，他们的邪恶本质显露无遗：他们捕获了受害者的肉体 and 心灵，生产出满足市场需求的健康肉体 and 富有牺牲精神的受害者。可以说，正是现代文明的精细劳动分工在一定程度上生产了监护人的道德盲视，如米格拉姆所言：“当一个人只是邪恶行为链上的一个中介环节，并远离行为的最终后果时，就很容易从心理上忽视责任。”(*Obedience*: 11)

社会分工导致的道德冷漠也体现在受害者身上，典型的代表就是因自己出色工作而志得意满的看护员凯西。看护员这一职业均由受害者担任，而且，令人寒颤的是，几乎所有受害者在器官“捐献”前都要担任看护员。表面上，看护员的任务是照顾那些已经开始“捐献”器官的受害者，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便利，帮助他们尽快康复；但与“监护人”一样，“看护员”这一职业也有着丑陋的道德本质。在小说的开头，凯西告诉我们：“我的捐献者总是倾向于比预期做得好。他们的恢复时间引人注目，而且他们中几乎没有人被归类为‘焦躁不安’，甚至在第四次捐献前也是这样。好了，也许我在自吹自擂。但是能将我的工作做好，尤其是让我的捐献者保持‘平静’，这对我意义深远。”(*Never*: 3)可见，所谓优秀的看护员就是其服务对象康复速度快，并能在器官“捐献”时保持平静。但是，尽快康复的目的不过是为了下一次“捐献”，而受害者平静的

情绪则意味着他们毫无反抗地走向手术台及死亡；因此，看护员实际上是杀人者的帮凶和同谋，他们与“正常人”一起将受害者推向死亡。凯西等受害者并不比那些施暴者在道德上更善，小说中也没有完全无辜的受害者。不可否认的是，凯西之所以能从本质上邪恶的工作中体验到价值感，监护人的奴化教育、受害者本身的无权状态及权威体系的奖赏均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忽视社会分工在此所起的道德麻痹作用。如同监护人一样，看护员在邪恶生产线上只扮演了一个小角色，完成了一个小步骤，他们的行为与同胞死亡之间的关系间接而又脆弱。凯西虽然目睹了鲁丝的死亡并为此难过，但她并不痛恨自己的工作，也不会由此产生对自我道德责任的批判性认知，她对自我行为的后果只有一个孤立、抽象的认知，因而能够将自我从道德检审中解脱出来，继续心安理得地扮演施暴者的同谋。

在社会高度专业化、分工异常精细的情况下，行动者的注意力被转移到一个完全相反的方向上，即如何做好眼前工作，正如鲍曼所说：“一般来说，行动者都想出类拔萃；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都想做好。一旦他们由于官僚体系内部复杂的功能划分而远离了他们的行动所引致的最终后果，他们的道德关注就会完全集中到很好地完成手边工作上。道德也就归结为要做一个好的、有效率和勤劳的专家和工人的戒律。”（《现》：136）在漫长、复杂的生产线上，凯西的关注点就是如何成为一名出色的看护员，她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从一个疗养机构奔向另一个，照顾一个又一个的受害者，一次又一次地将他们推向死亡。尽管她的服务对象最终都不免一死，如汤米所说，“好吧，一个好的看护员让人开心。但是最终，这真的很重要吗？捐献者依然要捐献，然后他们会圆满”（*Never*：282），凯西依然勤勤恳恳地工作。她不关心自己为什么而工作，也不在乎这一点，敬业的她实际上用技术责任^①代替了道德责任，用工作的细枝末节进行自我麻痹，逃避对现实的思考。积极投入上级规定的任务、成为一名出色的看护员成为她唯一的人生目标，这是她的使命，出色地完成它是她的分内之事，其实质及后果则可忽略不计。只有关注眼前工作，关注技术责任，她才能高效地完成任务，成为一名出色的看护员，获得嘉奖，而上级的嘉奖进一步强化了看护员职业的合法性，钝化了凯西的道德判断，使她无法认识到自己表面看来无伤大雅的工作如何在本质

^① 关于技术责任与道德责任的区分，鲍曼认为，“技术责任忘记了行动是达到行动本身以外的目的的一个手段”（《现》：135）。也就是说，技术责任只关注行动的技术，关注将眼前的行动做好，忽略对行动的实质及结果进行道德评价。

上加剧了同胞的苦难，她的无知和道德盲视被漫长的生产线进一步强化，让她可以继续作为一颗小螺丝钉运转在邪恶的生产线上。

用技术责任代替道德责任的不止凯西一人，甚至像鲁丝、汤米这样具有一定叛逆精神的受害者最终也被这条生产线所吞噬，成为其免费劳动力。在这条邪恶的生产线上，有无数个凯西。对于他们来说，眼前的工作如此琐碎，他们只是机械地、按部就班地完成任务，以至于他们要么在道德上掉以轻心，要么根本漠视道德。受害者尚且忽视自身职业的邪恶本质，更遑论小说中那些从器官生产线上获益的施暴者、普通人了。

但是一些施暴者必然要和受害者面对面地相遇，他们和受害者足够接近以至于可能对受害者产生同情，或者不可避免地看到自身行动的可怕后果，最终可能从麻木不仁中苏醒，打破道德冷漠。为了确保他们能在道德上继续无所作为，就需要有另外的方法来确保施暴者在身体、功能距离缺失的情况下对受害者产生合适的心理距离。

三、对受害者的身心隔绝与道德冷漠

在小说中，不管是幼年时期还是长大成人后，受害者始终在身体上与社会隔绝。凯西等受害者幼年生活的黑尔什姆周围不仅有“铁丝网边界”（*Never*: 47），更有重重树林将它与外界隔绝，受害者被圈禁于此，远离普通人。成人后，受害者在各种偏远空间接受职业培训，没有机会与普通人接触，甚至主动避免这种接触，凯西说：“我们甚至不到周围的乡村散步或者到附近的村子里闲逛。我并不认为我们真的害怕。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到处闲逛的话，没有人会阻止我们。”（*Never*: 118）可见，受害者已经习惯了他们的隔绝状态，不愿意逃离隔离区——他们已经无法习惯外界社会，隔离区虽然孤独，却成了他们唯一能够承受的地方。汤米等器官“捐献者”居住的“疗养院”周围有铁丝栅栏，他们无法自由出入；看护员似乎享有较多人身自由，但是从鲁丝冒着生命危险才得到玛丽-克劳德的地址这一事件可以看出：看护员的一举一动也都被严格监视，形同囚徒。

简言之，受害者始终被迫生活在人类社会的边缘地带，与普通人保持着相当的身体距离。他们实际上被封锁起来，在身体上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及主流社会的关注中消失，这使得他们“被有效地从视野当中抹去，他们最多是被别人听说的一类，因此别人听说的有关他们的一切都没有可能转变为有关个体命运的知

识,也就没有可能与亲身经历对照检验……发生在一个被区隔的群体中的一切都不为其他人所关心,进而在人际交往中把一切转化为谈资也就没多少意义了”(《现》:250)。可以说,身体隔绝使得受害者不再是活生生的具体存在,不能成为小说中“正常人”同情的对象及道德责任关怀的“他者”。

除了身体隔绝外,受害者与普通人在心理上也处于隔绝状态。小说中的主流社会对受害者进行了歧视性的定义,认为他们没有灵魂,“仅仅满足医学所需。在战后早期,对大多数人来说,那就是你们——试管中的阴影物”(Never:261)。对于普通大众来说,由于与受害者没有任何交集,对他们缺乏了解,也乐于接受社会流行的对受害者的歧视性定义,将他们当作没有灵魂的肉体这一抽象的原型。由于没有灵魂,受害者就不是人,这是主流社会的逻辑——在他们看来,只有人才有灵魂,只有在人的身上才能体现灵魂与肉体的结合。由于不是人,受害者也就不属于人类共同体,因此与普通人在心理上、精神上有着无法弥合的鸿沟。

在解释犹太大屠杀时,费恩提出义务范围(universe of obligation)这一概念。在通常情况下,处于支配地位的群体规定义务范围的界限,界限内的成员互惠互利,互相保护,作恶者对其伤害及侵权就是对集体良知的冒犯,会遭致惩罚。而对于义务范围外的个体或群体的伤害则不会导致此结果;相反,暴力则可能被解释为对于他们冒犯主流群体行为的公正惩罚。^①显然,主流社会对受害者的歧视性定义实际上将他们排除在义务范围之外,他们不被共同体所保护,不属于道德关怀的对象,因而普通人带着冷漠的眼光看待他们:他们没有利益值得考虑,也没有要求被公正对待的权利,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暴力不仅正当,更是他们咎由自取的结果。于是,对于那些不可避免地看到自身行动造成可怕后果的施暴者——例如小说中那些亲手操刀切割受害者身体器官的医生——来说,由于其施暴对象已经被有效地非人化,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作恶。

但是,一些暴行执行者必然会在日常生活中与受害者产生交集,与他们足够接近,看到他们的人性,对他们产生怜悯之心,最终物理上的相邻变成心理的、道德的亲近,精神隔绝被打破。例如,一些监护人与童年时期的受害者朝夕相处,通过日常接触意识到他们有灵魂,与普通人有相似性,与之产生了精神上的亲近。所以,露西试图向受害者暗示真相;而艾米莉、玛丽-克劳德等则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力图改变大众对受害者的刻板印象,让他们获得人性

^① See Helen Fein, *Accounting for Genocide: National Response and Jewish Victimization during the Holocaust*, New York: Free Press, 1979, p. 33.

化的对待。他们为了受害者的利益四处奔走，黑尔什姆及类似人性化机构的建立就是他们努力的结果。这些监护人对受害者的亲身印象与大众眼中抽象的原型不符，他们通过日常接触认识的“他者”与作为抽象原型、没有灵魂的“他者”没有任何联系：前一种“他者”属于道德关怀的对象，值得同情与人性地对待；而后一种则被严格地排除在义务范围之外，任人宰割。

但是监护人与受害者的精神、心理亲近是权威阶层、受益者所不允许的；因此，必须想方设法预防、减少物理上的相邻变成精神与心理上的亲近的可能性。在小说中，这主要通过让人对受害者心怀厌恶与恐惧来实现。凯西、鲁丝等受害者在儿时就觉察到监护人对他们的恐惧，为了验证这一点，他们有一次突然出现在到访的玛丽-克劳德身边，观察她的反应：“她僵住了，等着我们走过去……我[凯西]到现在依然可以看见她似乎正在压抑的颤抖和真正的恐惧——我们中的一个会无缘无故地碰到她。”（*Never*: 35）凯西等人意识到，玛丽-克劳德害怕他们，就像一个人害怕蜘蛛。艾米莉则直截了当地告诉凯西和汤米：“我们都害怕你们。在黑尔什姆的每一天，我自己几乎每天都需要与我对你们的恐惧作斗争。有时候，我从书房窗口看着你们所有人，我会感觉到强烈的厌恶。”（*Never*: 269）

监护人对受害者怀有的厌恶和恐惧与茱莉亚·克里斯蒂娃所分析的自我在遭遇贱斥物（the abject）时的反应一致。克里斯蒂娃将个体、集体对他者的厌恶与恐惧类比为自我在遭遇某一食物、污秽物、废弃物、粪便甚至热牛奶表皮、死尸时的反应，她将这些反应称为贱斥（abjection）。^①自我与贱斥物的每一次遭遇都让人想起婴儿最初对母亲身体的贱斥：婴儿只有将母亲身体当作贱斥物来排斥，才能建立起与母亲/他者之间的界限，形成完整的自我意识，进入象征界。如同婴儿，个体/集体通过排斥、远离贱斥物而与之区分，划定二者之间的清晰界限，最终建构个体/集体身份。

在小说中，监护人将受害者当作贱斥物，回避与他们的接触，拒绝将他们当作与己无异的普通人，这让二者之间脆弱的精神、心理亲近几乎被湮灭，偏见的壁垒被重新建筑起来。通过贱斥受害者，自我与他者之间的界限再次被划定，精神、心理隔绝再次被强化，某些内心受煎熬的监护人的道德良知再次处于休眠状态：既然受害者与我们迥异，是不值得同情的他者，也就无须担忧施加在他们身上的痛苦。施暴者能够从贱斥受害者中获得心理安慰：“他们试图说服自己，你

^① See Julia Kristeva,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trans. Leon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2, pp. 2-3.

们并非真的像我们。你们不是人，因此没关系。”（*Never*: 263）正如凯尔曼所说，施暴者“能够为他们自己和其他人施加在受害者身上的事情找到合理借口的唯一方式，他们能够从他们正在参与的可笑事情中得出意义的唯一方式就是逐渐相信：受害者是次人类，他们活该被屠杀”^①。对受害者的贱斥让监护人在身体、功能距离缺失的情况下与受害者保持心理距离，有效防御在他者中生活所存在的危险，道德驱动力的影响被弱化，最终归于沉寂。只要主流社会有对身体器官的需求，受害者有可资利用的价值，他们就会继续被贱斥、被非人化，如艾米莉所说：“这个世界，它要求你们学生捐献。只要情况一直如此，就总会有障碍阻止将你们当作普通人。”（*Never*: 263）艾米莉这句话彻底暴露了如下事实：受害者与普通人本质上并无异，二者之间的差别、心理隔阂乃是社会文化操纵的后果。

从以上分析也可见，艾米莉等监护人对受害者怀有矛盾态度：一方面，他们对受害者产生恻隐之心，与之在精神上亲近，为之四处奔波；另一方面，他们又将受害者当作贱斥物，与之在精神上疏远。这种矛盾态度实际上反映了施暴者群体中某些人内心经历的情感与理智的斗争。他们遵循内心的道德直觉，为了受害者而发起社会运动，但是迫于权威的压力与威胁，他们只能在权威允许的范围内理智行事，如艾米莉所说：“我们从未与现实脱节。”（*Never*: 262）因此，当权威不再支持时，监护人很快放弃一切努力，退回到道德冷漠状态中。他们清醒地知道一场可怕的冤屈正在上演，却缺乏足够的勇气与权威抗衡，最终选择违背个人良心的声音，而与权威及主流社会的“良知”保持一致；他们将受害者当作贱斥物、不值得关心的他者，以最便捷的方式让良心获得宽慰，文明社会尚存的最后一点点道德良知被泯灭，文明在与非人道的遭遇中全面溃败。可见，监护人与受害者的心理隔阂归根结底是他们暴露在垄断了社会道德的专断权威面前的结果。如果与受害者身体距离最近、日常生活中与他们有交集、最有可能对他们产生道德责任的监护人最终都与之保持着精神、心理隔绝，可以想象那些生活中与他们没有交集、仅仅接受官方歧视性定义的普通人及其他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心理隔阂。

总之，主流社会采取种种手段确保受害者在身体上、心理上都处于隔绝状态，最终后果是受害者的“脸”被抹去。道德哲学家列维纳斯认为，道德行为由作为一张“脸”而存在、没有任何力量的他者所驱动。他者之“脸的本质是道德的”^②，

① Herbert Kelman, "Violence without Moral Restraint", p. 50.

② 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trans. Alphonso Lingis,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79, p. 199.

它的第一句话是“你不要杀人”^①，它以其无力、赤贫、饥饿而对“我”发出召唤，“我”无法对此充耳不闻；它不以惩罚的威胁和奖赏的承诺而对“我”提出要求，它的要求也不带任何约束力，但是却激起“我”心中的至善，让“我”的行为体现为责任和义务。相反，将受害者的“脸”抹去就是“将行动对象置于一个他们不能把自己当作道德要求之源而对行动者形成挑战的位置；就是说，将他们从这样一类存在中驱逐出去：作为一张‘脸’而可能与行动者相遇的一种存在”（《现》：280）。受害者被从人与人的遭遇中赶走，他们的“脸”不再可能成为道德要求而为普通人所见，无法对普通人发出道德召唤，要求他们承担对他者的责任。最终，普通人能够带着道德冷漠的眼光来看待受害者，而形形色色的施暴者则越发将受害者当作可以计数、可以进入他们报告、没有“脸”的身体——它们将决定他们的效率和升迁，使他们能够履行邪恶职责，又同时确保他们的道德良知不受损害。

合法权威对暴行的授权及通过赏罚制度对个体的操纵、精细的社会分工、对受害者的身心隔绝，使得包括形形色色的施暴者、普通大众甚至受害者在内的整个文明社会在道德上变得麻木不仁，从而给予暴行“道路畅通”的信号，使得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屠杀成为可能。文明社会的某些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使道德沉默的力量，削弱了道德对暴行的约束，非人性变得合法，残酷的社会属性似乎远远多于个体的性格特征。石黑一雄借助科幻小说的体裁来摆脱具体社会历史语境的限制，探讨至今依然困扰人类社会的一些棘手而又重要的问题。对个体道德进行操控，让整个社会处于道德瘫痪状态，从而使得屠杀畅通无阻，这在人类历史上发生过，现在依然在发生，将来还可能发生。《千万别让我走》所虚构的那个文明程度极高、科技高度发达的未来社会也可能产生导致大众道德沦丧的社会机制。

[作者简介] 女，1980年生，北京外国语大学英美文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系讲师，研究方向为英国现当代文学。近期出版的专著有《抵制遗忘：石黑一雄小说的创伤书写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6年）。

责任编辑：龚 蓉

^① 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p. 199.